

从“边缘”到“在场”：基于深度访谈的阳朔与灵川女性公共参与研究

蒋灵卉, 叶思恩, 陈雪, 李丹, 陈洁华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DOI:10.61369/SE.2026050018

摘要： 基于对桂林阳朔县与灵川县37位基层女性、社区干部、男性村干部及女大学生的深度访谈，本文呈现了两县女性在公共事务参与中的真实样态。研究发现：女性参与呈现明显的群体分化——文旅从业者与基层女干部形成“参与标杆”，而普通农村女性、老年女性和部分生意人仍处于“参与边缘”。制约因素包括信息渠道封闭、传统性别分工、组织动员薄弱与生计时间挤压。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女性的参与意愿显著增强，但缺乏转化路径。研究呼吁从“信息可达性”和“组织可及性”入手，推动基层女性从“被动知晓”走向“主动在场”。

关键词： 基层女性；公共事务参与；深度访谈；阳朔；灵川

From Periphery to Presence: A Study on Women's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Yangshuo and Lingchuan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Jiang Linghui, Ye Sien, Chen Xue, Li Dan, Chen Jiehu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Abstract：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37 grassroots women, community officials, male village cadres, and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Yangshuo County and Lingchuan County in Guilin,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actual patterns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across both counties. The research reveals a clear group differentiation in women's engagement: cultural and tourism professionals and grassroots female officials serve as "engagement benchmarks," while ordinary rural women, elderly women, and some businesswomen remain on the "engagement periphery." Restrictive factors include limited information channels, traditional gender divisions of labor, weak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capabilities, and time constraints related to livelihoods. Meanwhile, younger women demonstrate significantly stronge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but lack effective pathways for implementation. The study advocates addressing "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 and "organizational accessibility" to facilitate a shift from passive awareness to active participation among grassroots women.

Keywords： grassroots women; public affairs participation; in-depth interviews; Yangshuo; Lingchuan

引言

在乡村振兴与全域旅游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基层女性日益成为乡村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笔者此前基于问卷调查与统计数据，对阳朔县与灵川县女性公共事务参与的特征进行了量化比较，证实两县在参与深度、组织化程度与政策落实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然而，数字背后的“故事”——女性自己如何理解参与？她们为什么参与或不参与？代际之间是否存在观念变迁？——这些问题需要质性研究来回答。

深度访谈的价值在于，它让被研究者发出自己的声音，揭示统计数据无法呈现的日常逻辑与情感体验。2024年1月至7月，研究团队在阳朔县与灵川县开展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对37位不同身份的女性、男性村干部及女大学生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受访者包括妇联工作人员、社区女干部、文旅企业员工、普通农村女性、留守老人、男性村委书记以及返乡女大学生，覆盖了不同年龄、职业与参与程度的群体。本文以这些访谈资料为基础，采用主题分析法，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哪些女性在参与？哪些女性不参与？她们自己如何解释？年轻一代的观念是否在变化？

课题信息：

蒋灵卉——2023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文旅融合视域下漓江流域传统村落景观保护与活化研究》（项目编号：23BMY010）；

叶思恩——2025年广西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女性公共参与路径研究——基于桂林阳朔、灵川的调研》（项目编号：X2025106020148）。

一、谁在参与：不同女性群体的参与图景

（一）标杆型：文旅女性与企业带头人

在阳朔，文旅产业为女性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独特的“场景入口”。谢大姐啤酒鱼是阳朔知名的文旅品牌，其创始人黎永红从事餐饮业三十余年，不仅将啤酒鱼打造成地方名片，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据该企业一位员工介绍：“老板会参与学校捐赠活动，给孩子们送书包、课本，传递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这种“产业成功+公益参与”的模式，使女性企业家成为看得见的标杆。

阳朔县供销合作社的女性参与情况也颇具代表性。该单位女性工作人员占比约六成，B女士（股长）描述道：“活动组织与决策都会遵循民主商讨、综合决议机制。女性因细心、注重细节，参与度较高。”在这里，公共事务参与不是额外的“奉献”，而是日常工作的自然延伸。文旅与公共服务的结合，使女性在职业场景中完成了参与能力的积累^[1]。

（二）组织型：社区女干部与妇联工作者

如果说文旅女性是“产业驱动的参与者”，那么社区女干部就是“使命驱动的组织者”。凤鸣社区的A女士已在社区耕耘十余载，最初怀揣“帮助更多人”的初心投身工作，现任社区副主任。访谈中她提到，曾遇到一名成绩优异但家庭困难的留守儿童，她积极奔走、联合社区力量资助孩子继续学业；每年毕业季，她还会为社区大学生介绍兼职机会。这些工作不求回报，纯粹出于责任与热爱。A女士的故事表明，基层女干部不仅是参与者，更是参与机会的创造者。

北门厄社区的C女士则是另一种典型。她于2023年关注到社区招聘启事，以此为契机进入社区工作，参与组织团日活动、妇女节及儿童节活动。她提到：“社区文娱活动丰富，广场舞很热闹，还成立了广场舞志愿协会。女性参与约占五成，女大学生在志愿活动里尤其积极。”这里的“广场舞志愿协会”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组织形态——它将日常娱乐转化为公共参与的平台，降低了参与的心理门槛。

（三）观望型：普通女性与留守妇女

与上述两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普通女性。在灵川县的访谈中，研究团队遇到了多位60岁以上的农村女性，她们的叙述呈现高度一致的“不知道、不参与、不指望”。

李奶奶的话很有代表性：“都是男的去开会，女的不参与的……村里有什么会议，也是她爷爷去开，男的去，一般都是男的管事的。”当被问及是否知道村里哪位女性参与公共事务时，她回答：“我们的管事是大队部门主任管的，整个大队都是部门来安排，一般我们妇女不管的。”这种“管”与“被管”的二分，反映了传统性别分工在乡村治理中的深层嵌入。

七位奶奶的群体访谈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模式。她们当时正在加工一种叫“天冬”的药材，以此增加收入。当被问及选举参与时，一位奶奶说：“一般都是党员和村里的队长才有资格的，我们不行的。”另一位补充：“选了他就干，没选到他不干。每五年换一届，结果在公告栏上看到才知道。”信息获取的滞后与资格感的缺失，使她们成为公共事务的“局外人”。

蓝阿姨的访谈则揭示了唯一的“参与入口”——广场舞。“就只有跳广场舞这个咯，是村委书记老婆组织的。”广场舞固然是一种积极的文化活动，但它是否能够通向真正的公共决策？答案

似乎是否定的。广场舞更多是一种“被组织的参与”，而非“参与式的组织”^[2]。

二、为何不参与：制约因素的质性呈现

综合上述访谈材料，基层女性公共事务参与的制约因素可以归纳为四重叠加。

（一）“我不知道”：信息渠道的封闭

信息不对称是第一道门槛。多位受访女性表示，她们不清楚村里有什么活动、什么政策、什么选举。一位灵川女性群众直言：“这种我们不清楚喔。”另一位说：“男的在微信大群，女的都不进。”微信群作为基层治理中最重要的信息发布渠道，却将女性群体排斥在外——不是制度性地禁止，而是社会性地默认“女的不用进”。

女大学生小燕的遭遇更具代表性。她在桂林读书，希望参与志愿服务，但发现“桂志愿上看到过附近的活动，离家有距离，也不方便去。”更关键的是，“我们村里没有举办过社区活动，也没有参加过。没人带，甚至没有举办过。我没有什么渠道得知这些活动举办的消息。”信息从“发布”到“触达”之间存在巨大的断裂带，而这道断裂带对女性而言尤为宽阔。

（二）“男的管就行了”：传统性别分工的内化

比信息封闭更深层的，是观念的内化。李奶奶说“都是男的去开会”，语气中没有不满，只有“本该如此”的理所当然。这种观念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被反复强化的结果。

村委书记的访谈从男性视角印证了这一点。当被问及村委事务管理五人中只有一名女性时，他回答：“按道理来说，其实我们觉得是有个比较好，我们一直都是这么样的，成为了一种惯例，没有妇女是不行的，妇女顶半边天是吧。”表面上是认可女性作用，但“惯例”“有个比较好”的措辞，暗示了女性角色在基层治理中的“补充性”而非“主体性”。他随后补充道：“也不一定，这是要看能力的，不管男女都是要能力过得去的。”这种“能力主义”话语看似中立，实则掩盖了结构性机会不均——女性在缺乏参与经验的情况下，如何证明自己的能力？

（三）“没人带、没活动”：组织动员的薄弱

灵川县妇联工作人员的访谈直接点出了组织层面的问题。该工作人员表示，妇联的主要职责是“上传下达，收发上级通知，传达乡镇妇联以及群众来信来访，解决一些家庭暴力、妇女权益保护之类的事务”，而“没有太多组织女性群众的活动”。当被问及原因时，她提到“财政紧缩，慰问活动的物资和举办频率会有所减少”。

这种“重管理、轻动员”的职能定位，使得妇联作为女性参与的组织载体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相比之下，阳朔有“环保妈妈”志愿服务队、网约配送行业妇联等创新组织形态，而灵川则缺乏类似的平台。女大学生小亚的感受很直接：“灵川志愿活动不多。”组织供给的不足，直接导致了参与机会的匮乏^[3]。

（四）“忙着生计”：时间的结构性挤压

对于普通女性而言，参与公共事务是一种“奢侈品”。一位桂林米粉店的女店长坦言：“参加社区活动有意愿，但是比较少。节假日反而更忙，没有时间参与。旅游人虽然一直很多，但是店

也多，狼多肉少，竞争大。”时间是零和的：用在生计上，就无法用在参与上。

在灵川农村，许多女性利用农闲和淡季加工药材、编草鞋以补贴家用。她们不是“闲人”，而是“忙人”——只是她们的忙碌不被计入GDP，也不被计入公共事务的参与统计。当公共事务参与被设定为“业余活动”时，那些没有“业余”的女性就被自然排除在外^[4]。

三、观念在变：代际差异与性别认知的转型

与老年女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年轻一代。女大学生群体普遍表现出更强的参与意愿和更平等的性别观念。

小木的话很有代表性：“我看到她们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时，其实也想尝试一下，做一个大学生村官什么的。或者是等我更有资历、年纪更大之后，可以回到村里去尝试参与类似的工作。”小陈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愿：“她们冲破了一些刻板印象的束缚……去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这件事，我觉得是能够看到女性的光芒的。”

值得注意的是，年轻女性的榜样来源已经超越了身边的具体人物，扩展到媒体传播的“远程榜样”。小森提到：“像这几年人们所赞扬的黄文秀、梁小霞、张桂梅等代表的女性力量，都是不容质疑的，而这些力量也深深触动着我。”媒介化的榜样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身边参与案例不足的问题。

然而，意愿并不等同于行动。小燕、小亚等人明确表示不知道如何获取参与信息、没有合适的活动可以参加。年轻女性的参与意愿处于“待激活”状态，缺乏将意愿转化为行动的组织通道。从“愿意”到“在场”，中间需要一个“可达性”的桥梁。

男性视角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村委书记承认女性在耐心、细心方面的优势，“女的事情女的去做，她们比男的好”。这种认知是积极的，但尚未转化为制度化的参与保障。正如一位受访的女大学生小木所指出的：“虽然国家要求必须要有女性在其中担任职务，但还是有很多女性的职务只是名义上的，并不拥有真正的权力。”从“有女性”到“女性有实权”，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四、讨论：从“个体故事”到“结构问题”

上述访谈材料呈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女性说“我愿意，但是……”——愿意但不知道信息、愿意但没时间、愿意但没人带、愿意但觉得自己不够格。这个“但是”之后的内容，构

成了参与的结构性障碍。

本研究认为，基层女性公共事务参与的核心问题不是“意愿不足”，而是“可及性缺失”。“可及性”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信息的可及性——女性能否及时、便捷地获取参与相关的政策、活动、选举信息；二是组织的可及性——是否有低门槛、就近、灵活的组织载体能够吸纳女性参与。阳朔的经验表明，当文旅产业提供了“场景化”的参与机会（如环保妈妈、民宿协会），女性的参与率会显著提升；灵川的困境则说明，单纯依靠政策文本而缺乏组织落地，再完善的配额制度也难以转化为实际参与。

这一发现对当前乡村振兴中的性别政策具有重要启示。政策不能只停留在文件里，需要通过女性可达的渠道真正“落下去”。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将微信群、网格员入户、便民活动点等纳入政策宣传的基础设施，确保信息触达每一位女性；二是培育低门槛的参与组织（如广场舞志愿队、女性互助小组），让参与从“正式会议”延伸到“日常生活”；三是将妇联的工作重心从“行政事务”转向“动员组织”，改变“重管理、轻动员”的职能偏差^[5]。

五、结论

基于阳朔与灵川两县37位女性的深度访谈，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女性参与呈现明显的群体分化。文旅女老板和社区女干部是“参与标杆”，她们在产业和行政场景中积累了资源与能力；而普通农村女性、老年女性和部分生意人则处于“参与边缘”，她们的参与需求与参与能力之间存在巨大落差。

第二，制约因素可归纳为信息封闭、传统观念、组织薄弱、时间挤压四重叠加。其中，“信息不知道”是最直接的门槛，“观念内化”是最深层的障碍，“组织缺位”是结构性的短板，“生计挤压”是现实性的约束。

第三，代际观念正在转变。年轻女性的参与意愿明显强于老年女性，她们通过媒体接触到女性榜样，产生了“也想试一试”的想法。但意愿尚未转化为行动，关键在于“最后一公里”的组织通道尚未打通。

第四，政策启示在于：从“配额思维”转向“可及性思维”。与其设定指标要求“必须有女性”，不如疏通信息渠道、搭建参与平台、降低参与门槛。当女性能够“知道、能够、有时间、被邀请”参与时，她们自然会从“被动知晓”走向“主动在场”^[6]。

参考文献

- [1] 谷玉良. 女性治村：农村基层生活治理与女性参与——基于H省Y村的案例分析[J]. 民俗研究, 2020(3): 124-132.
- [2] 彭善民, 张易为. 情理之间：社区治理中的女性参与——以基层妇女议事会为例[J]. 妇女研究论丛, 2022(4): 43-56.
- [3] 肖周燕. 影响农村基层青年女性参政积极性的个体因素分析——以广西为例[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12(2): 166-170.
- [4] 余蒙双.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妇女发展问题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 2022.
- [5] 左冰. 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旅游学刊, 2021, 36(6): 12-14.
- [6] KABEER N. Resources, agency, achievements: Reflections on the measurement of women's empowerment[J].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99, 30(3): 435-464.